

新民学会及在南洋的
活动情况（等）

张国基



新民学会及在南洋的活动情况

张 国 基

一 新民学会成立的时代背景和初期的活动

我是一九一五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后就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他是学生领袖，声望很高，全校成千个同学都认识和尊敬他。所以我一入校，就受了他的影响，经常向他请教。他性情温厚，平易近人，所以同学们都喜欢接近他；他也谆谆地指导同学们走上革命的道路。

毛泽东同志寻找革命的同志，组织新民学会是有其时代背景的。当毛泽东同志在一师学习的时期，是辛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失败，袁世凯窃国称帝，虽然后来袁世凯被打倒了，但南北军阀纷纷投靠帝国主义，他们各霸一方，混战不休。贪官污吏，买办豪劣互相勾结，鱼肉人民，真是群魔乱舞，民不聊生。毛泽东同志和柳詒子同说：“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正是那种黑暗写照。因为全国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日益走向破产的境地。许多爱国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愤于中国社会的黑暗，继续寻找救国救民的出路。

毛泽东同志深知：要革命一定要结合广大群众，一定要建立一个领导革命的团体。所以在一九一五年，他就向省内外

发出了有名的“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这启事大约有二、三百个字，是他自己刻蜡纸油印的。大意是二十八画生要求和有爱国热情的青年，特别是不怕艰苦，肯为祖国牺牲的志士和他通讯联络，结成团体，为改造社会，改造中国而共同讨论，共同努力，共同奋斗。信封上还写着请张贴在大家看得见的地方。长沙市有一家报纸，接到毛泽东同志寄来的启事，觉得很好，就免费地登在报上。启事发表以后，本来希望有许多青年回信响应，但当时社会风气还很闭塞，一些青年学生不敢勇于立即表示个人意见，所以得到的回信并不多。

因为响应征友的来信不多，于是毛泽东同志就从本校同学中寻找朋友，再由校内发展到校外，后来逐渐发展到省外以至国外，征得了不少朋友。当时封建势力还很大，男女青年分校学习因此没有女同志。他想：革命就是要解放全人类，妇女半边天，没有她们参加，革命是很难成功的。一定要解放女同志，争取男女平等。因此他就给在长沙的几个女子学校的同学写信，征求她们来做朋友，联络各方面的力量。

经过将近两年的酝酿，毛泽东同志和他的朋友们经常交流读书心得，谈论个人与社会，国家的前途，他们认为时局太危急了，学问的需要太迫切了，深深觉得有结成团体的必要。

一九一八年四月十八日，一个星期天，在长沙岳麓山下溁湾市蔡和森同志的家里，开了新民学会的成立大会。这天到会的人有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罗章龙，张昆弟，李维汉，萧子暲，萧子昇，邹蕴真，陈书农等十多人，会上通过了一个由毛泽东同志起草的章程。会章规定：会员必须遵守如下纪律：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狎妓。

新会员入会要由会员三人介绍，经评议会通过。大家首先选举毛泽东同志为评议会总干事，他谦辞了，但最后仍选他为干事。这天还交了第一次会费。

会员资格要求是相当严的。学问品德不好和没有远大志向的人不能加入。会员大多数是第一师范的最优秀的学生，此外还有长沙一些学校的进步教员，如楚怡学校，修业学校，周南女校等的教员。随后又吸收了罗学瓚，陈昌，熊瑾玎，周世钊，向警予，谢觉哉，罗宗翰，张国基，蒋竹如，欧阳泽，易克楹，夏曦，蔡畅，彭璜，李思安，周敦详，劳启荣，魏璧，李振翩，易礼容，郭亮，萧道五，陶斯咏，熊季光，任培道等人加入。

学会大概每周或半个月开会一次，研究学术上或当前国事问题，报告学习和工作计划，也相互批评和提意见。正如毛泽东同志词中所说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会议大多由毛泽东主持，并作会议讨论的结论。

新民学会成立后不到三个月，毛泽东同志就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将要走出社会工作了。在这依依惜别的时刻，会员们都有向外寻求新思想，新科技，新文化的要求。但如何去寻求，需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因此毛泽东同志就在这年六月假一师附小召开会员大会，确定会员今后奋斗的目标和应走的道路。

当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的时候，整个西欧各国的大中城市被数年猛烈的战火轰得遍地破瓦颓垣，几乎没有一座完整的房屋，尤其是法国的首都巴黎，它是战争的中心，更是疮痍满目，残破不堪。战后恢复工作艰巨，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除我国派出参战残存的几万工兵留在该地之

外，还需要大量的人力支援建设和扫除兵燹残迹。并且在大战前夕，我国的北京、上海已建有华法教育会，是当时的所谓社会名流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等创议赴法留学的机构。因此我们就在这次会员大会上确定向外发展，首先是搞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推派蔡和森，萧子昇前往北京与蔡、李等联系赴法勤工俭学的工作，毛泽东同志先在长沙组织一批有志赴法勤工俭学青年成立华法教育会湖南分会，随后毛泽东同志又亲自率领他们来到北京，这是毛泽东同志第一次来北京。他一到北京，就积极筹划赴法勤工俭学的事。但经济困难，不能不有一个工作维持自己的生活，就由北大教授杨怀中先生把他介绍给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同志。李就委派他为图书馆助理员。他在工作之余，一方面积极为推动留法勤工俭学的工作；另一方面在北大旁听哲学和政治理论，并结识了一些新的朋友，各方面都有一定的收获。可是他留京时间并不长，为了要到上海送第一批勤工俭学学生去法国，就在一九一九年初离开北京先去天津游览，然后经山东泰安下车登泰山观日出，到曲阜看孔陵，然后辗转经浦口，南京，到达上海，这是他第一次到达上海。他亲自去华法教育会联系为留法勤工俭学生筹措经济和办理一切赴法手续，直到送他们上了法国邮轮，他才休息。送走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生后，他停留不久，就回到长沙，住在修业学校搞教育工作。

二 依据会员大会确定的奋斗目标积极活动

毛泽东同志洞察当时的形势，把学会的重要活动分为国内，国外两方面去进行。在国内，主要在湖南，领导湖南的五

四运动和驱张运动；在国外，赴法勤工俭学和到南洋群岛从事华侨教育事业。现在先谈国内的活动。

（一）领导湖南的五四运动和驱张运动

巴黎和会中通过的对德和约，由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这个残酷的事实，使全国人民蒙受到忍无可忍的耻辱。受到十月革命影响的广大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更加认清了只有依靠广大群众，才能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首先发动的中国人民的伟大爱国运动——五四运动爆发了，革命的风暴立即席卷全国。以新民学会会员和非会员积极分子为骨干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在湖南的五四运动中是个最活跃的组织，起着先锋、带头作用。毛泽东同志自己写了要求大家行动起来传单，用几个学校学生会的名义散发出去。新民学会会员日益紧张的活动，动员各校学生准备罢课。就在六月三日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的当天，即通电全国，要求收回青岛，罢免曹、陆、章三个卖国贼。同时发布罢课宣言，长沙市所有大中学校当天一律罢课，湖南全省所有各级学校都相继罢课了。

湖南学生联合会第一任会长是彭璜，他是新民学会会员，商业专门学校的学生。我也是学联会成员之一。毛泽东同志因早已毕业，名义上不算学联成员，实际上他是参与统筹全局的。他原住在修业学校，学联成立之后，为了指挥方便，有时他就住在商业专门学校里。

湖南救国反帝的革命运动达到高潮之时，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十月革命的历史经验是十分

必要的，这样才能更广泛地发动群众，进一步地启发群众的觉悟。因此，毛泽东同志建议学联出版一种有高度政治思想性的定期刊物，大家一致通过，创办《湘江评论》，并推举毛泽东同志担任主编。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划，《湘江评论》创刊号在一九一九年七月十四日诞生了。起初只印了二千份，一天就销售完毕。赶着加印二千份，不几天又销售一空。当时有许多报章杂志，销数都不很多，而新出版的《湘江评论》一发行，就销四千份，这是少见的。

《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是毛泽东同志写的。他旗帜鲜明地宣扬敢想，敢干，彻底反封建，反军阀，反帝的政治思想。一起头就开宗明义地写道：“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族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湘江评论》在短短四十多天时间里，共出版了五期，每期发行五千份，每份有一万二千多字的文章，大部分是毛泽东同志写的。其中《西方大事述评》、《东方大事述评》、《世界杂评》、《湘江杂评》等专栏文章都是毛泽东同志个人执笔。

《湘江评论》的最重要的一篇文章是毛泽东同志写的《民众的大联合》。全文约一万字，连续分三期发表在《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上。当时北京出版的《每周评论》，四川成都出版的《星期日》等进步刊物都全文转载，并予以崇高评价。现在重读这篇文章，还觉得很有力量，难怪当时军阀、官僚、资本家认为这是过激党宣言。

这时，湖南千百万革命青年的革命热情，象火山一样爆发起来，猛烈地冲击了军阀张敬尧，冲击了一切官僚买办和土豪劣绅。仇视《湘江评论》如洪水猛兽的张敬尧，于一九一九年八月上旬的一个黑夜，派出荷枪实弹的军警，冲进承印《湘江评论》的湘鄂印刷公司，封闭《湘江评论》，并抢走了正在印刷中的第五期。

除了主办《湘江评论》外，毛泽东同志还指导学联会积极参加由当时湖南省商会和省教育会主持的国货维持会，推动以抵制日货为中心的救国运动。国货维持会派出许多学生到各商店去，一方面宣传爱国反帝，一方面检查日货，查出日货就封存起来。可是有些奸商阳奉阴违，暗中仍在贩卖日货。为了惩一儆百，国货维持会，学生联合会，绸布业分会联合举行游行示威，把全部查获的日货由游行队伍扛起，经过热闹市区，送到又一村教育会前面的广场，堆集一块，淋上煤油，放火烧了。

湖南地区的五四爱国运动兴起以后，湖南人民和革命学生的矛头就直指万恶军阀张敬尧。作恶多端的军阀张敬尧，原属北洋军阀中的皖系，是段祺瑞的忠实走狗。他是在一九一七年冬至一九一八年初，在北洋的直皖联军与南方的湘桂联军混战时闯进湖南的，爬上了湖南省督军兼省长的宝座。他横行霸道，作威作福，搜刮民脂民膏，摧残教育，钳制民主思想，湖南人民恨之入骨。五四运动一爆发，张毒始则严密控制，继则实行暴力镇压，禁止示威游行，停发教育经费，采用种种恶劣手段，进行反扑。这就火上加油，引起湖南全省工人、农民，学生和知识分子的一致行动，与他进行针锋相对的决死

战斗。

凶恶狡猾的张敬尧，为了要扑灭革命烈火，软硬兼施，一是加强武力镇压，一是收买湖南劣绅为他撑腰。他找到省劣绅头目曾重伯（曾国藩的孙子）出面，要召开一个什么“拥张公民代表大会”，企图以此来对抗驱张运动。毛泽东同志得知此消息以后，立即召集学联骨干和新民学会会员开会，研究采取有效措施，粉碎他们那个非法会议。我们分头联系各行各业组织起来，请他们届时都派代表去参加会议。开会那天的情况，现在我记忆犹新。会场是设在又一村省教育会会堂，我们学生骨干和预先联系好的各行业代表都准时到会，进入会场后，各按布置入座。会堂各个窗口和出入门户及台前几排都安排了负责人，约定一见信号就一齐动手。开会后，当曾重伯胡说八道扯到张督军如何如何德惠湘民时，台下突然有人高喊一声“打”，大家就齐声喊“打！打！打！”这时守门的关门，守窗的关窗，台前的凳椅飞向主席台，吓得台上那些出卖灵魂的劣绅魂不附体，夹着尾巴逃跑了。我们就登上主席台，一声令下，不许走动，迫使台下一小撮走卒各按原位坐下。随即宣布张敬尧祸湘罪状，散发各公团预先印好的“驱张宣言”，这样一来，就把他们的“拥张大会”变为了我们的“驱张大会”了。

驱张运动既已表面化，毛泽东同志就召集各公团代表开联系会议，布置下一步的工作。他说首先要利用军阀与军阀之间的矛盾，展开联合斗争运动。一九一八年初，南北军阀混战时，南败北胜。北军打头阵进入湖南的是吴佩孚。吴是北军大将，且立首功，应该获得湖南督军兼省长的位置。可是掌

据北洋军政大权的段祺瑞，是皖系的头目，所以他把湖南省的这个肥缺，给予了皖系的张敬尧，反叫吴佩孚冷冷清清地驻军衡阳，为他保卫长沙的南大门，以监视驻在郴州的谭延闿的南军。吴心怀不满，且与张敬尧有隙。其次是冯玉祥，他虽是安徽人，可是属于直系。当时他虽只是个旅长，可能在北洋军阀中有善战的声誉，他也不被重视。叫他驻在常德，为张敬尧守卫西门，以拒桂军。因此冯也久怀怨望。还有李根源，率一个师驻长沙任卫戍司令，看到张氏兄弟的横行霸道，也很不满意。当时毛泽东同志把军阀之间的这些矛盾分析得清清楚楚，于是就决定以湖南省各公团联合会的名义，派出代表分途游说，请他们协助驱张。会上指定我去衡阳找吴佩孚；石盛祖去常德找冯玉祥；蒋竹如、陈纯枢去郴州找谭延闿；长沙的李根源另找人去联络。

布置一定，马上分途出发。我拿着公团代表证和介绍函件，从长沙乘轮船到湘潭（因湘江水落，不能乘小火轮直达衡阳），在湘潭住易礼容亲戚家两天，然后雇小舟去衡阳，住在衡阳市西湖的教育会里。先通过联络，见到吴的参谋长，说明来意，请他与吴佩孚商约会见时间。过了三天之后，参谋长即来西湖教育会，接我去吴的司令部办公室，坐不一会，吴就出来接见我。坐定寒暄之后，他就屏退左右侍卫，连参谋长也叫走了。待我把张敬尧治湘批政陈述之后，他就说：这些情况，早有所闻，不过我是政府任命的军人，不便出面直接干预政治。湖南人民所受苦难与不满，我也知道和同情。你回长沙后，请你转达各公团，叫他们忍耐一下。我虽无法协助，但你们的意见，待有机会时，我会反映上去的。还有长沙方面的李司令，但

会就近加以保护。说到这儿，我就乘机请他写一信给李根源司令，他应允了。我们密谈约一个小时，他起立送客，仍由参谋长送我回西湖教育会，嘱我安心等候吴的亲笔信。两天以后，参谋长把吴的亲笔信送来。我把吴的信收妥后，就离衡阳回长沙。回到长沙，我先把吴的信交给毛泽东同志，并作了详细汇报。接着常德郴州的代表也相继回到长沙，工作都进行得顺利。不过长沙城里形势紧张，张敬尧正在作垂死挣扎，到处抓人。因此我们白天只能开秘密会议，晚上还要雇小舟睡在桔子洲畔的江面上。

由于张敬尧不发教育经费，一九一九年秋季，学校都开不了学。经过示威，请愿等大小斗争，才获得少量经费，迟迟于十月开学。学生一到校，革命声势又高涨起来，到十一月下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勾结日帝的卖国贼，焚烧日货的大示威又一齐爆发。张敬尧看到革命潮流来势凶猛，他就狗急跳墙。十二月初的一天，当长沙成千上万的工人，农民，学生和知识分子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张派来大批荷枪实弹的军警向革命群众进行疯狂镇压。参加游行示威的群众，不怕流血牺牲，同敌人展开了英勇斗争。

张敬尧镇压革命群众的残酷暴行，激起了长沙各界人民的极大愤慨。这天晚上，毛泽东同志又召集新民学会和学联紧急会议，讨论如何把驱张运动推向新高潮。会上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把工农群众，青年学生发动起来，与张敬尧进行坚决斗争。并决定了新民学会和学联下一步的行动。

为了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毛泽

东同志决定组织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上海，武汉，广州以及衡阳，常德，郴州等地活动，争取全国的同情和支持。许多会员都参加了代表团。毛泽东同志和会员李思安等经武汉赴北京，这是毛泽东同志第二次赴北京。在北京，他联合湖南在京各界，组织了旅京湖南各界驱张委员会，并在北京办了一个“平民通讯社”，专门报道驱张活动。彭璜，易礼容，何叔衡，夏曦等人从一九一九年下半年起先后赴上海、武汉、衡阳活动。彭璜等人在上海办了《天问》杂志，宣传驱张。到一九二〇年五月，北洋军阀中的直系首领冯国璋，曹錕与皖系首领段祺瑞，徐树铮利害冲突激烈，战争即将爆发，因此吴佩孚急着要撤兵北上，以加强直系力量，压制皖系。这时吴在衡阳的北军又与在郴州的谭延闿的南军取得默契，从五月下旬起，吴佩孚率所部由衡阳撤军，顺湘江而下，经长沙径去武汉。吴军北退一步，谭军跟着前进一步。张敬尧所部皖军人数虽多，但因军纪松弛，毫无战斗力。在南军随吴军拥至时，张敬尧就不战而溃。一九二〇年六月十一日，张敬尧仓惶逃出长沙，南军随后追赶。到六月底，张敬尧部队全部被赶出湖南，驱张运动获得全胜。

（二）鼓励会员向外发展

前面我已讲过新民学会在国内的主要活动，是领导湖南的五四运动和驱张运动，并取得伟大的胜利。现在我要再谈谈新民学会向国外发展和活动的情形。

湖南位处我国内陆的中部，人民习于安土重迁，很少飘洋过海到国外去的。因当时一些土豪劣绅，勾结万恶军阀张敬

尧，张敬汤兄弟，摧残教育，压制青年，逼得我们走投无路，才向外跑的。毛泽东同志，蔡和森同志等乘此大力鼓励和协助会员和会外的湖南青年，奋勇地向外发展，重点是去法国搞勤工俭学。这一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关键，其意义是极其深远和重大的。

新民学会的向外发展是由于受十月革命的影响和五四运动的推动。在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〇年两年当中，湖南革命青年向外发展的呼声高入云霄，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和受经济条件的限制，新民学会会员和湖南青年向国外活动的道路又分为两路进军。一路去法国勤工俭学，一路去南洋群岛从事华侨教育工作。这时湖南青年去法国的有三百余人，去南洋的也有二百多人。我们新民学会全体会员六七十人之中去法国的有蔡和森、萧子昇、张昆弟、李维汉、萧子璋、魏璧、欧阳泽、向警予、蔡畅等二十多人，占全体会员三分之一；而去南洋群岛只有张国基、李思安、周敦祥、萧道五、任培道等七、八人，比重是较小的。

关于赴法勤工俭学生在法国活动的情况，我想留法同志已有详细的记载，我就略而不谈。现在只谈谈我们在东南亚各地从事华侨教育的情形。当五四运动取得胜利，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在轰轰烈烈进行的时候，正巧又有南洋群岛华侨学校派遣专人回到国内聘请中小学教师，这样我们又多了一条向外活动的道路。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底，新加坡华侨中学校校长涂开舆先生回到上海，为新加坡华侨中学聘请一批教员，并代新加坡道南学校，吉隆坡尊孔学校和坤成女学聘请一些教员。我们一师前校长孔昭绶先生和学

監王季范先生就把我和姜心培同学介绍给涂，我们应聘以后，就在一九二〇年二月离长沙去上海会见涂校长。后就去领取护照和办理出国手续。涂也忙着购买图书仪器及等候其他教师，因此我们在沪待了近两个月。记得是四月初的一天，毛泽东同志和李思安同志等他们完成了在北京的请愿和驱张的宣传工作后来到上海，这是毛泽东同志第二次来到上海。他住在法租界的毕勒路，我们住在公共租界的棋盘街，相隔很近。我们常集在一起商讨驱逐张毒以后湖南的建设问题和新民学会发展的问题等等。毛泽东同志这次来上海，第一是为了联络在沪湘籍工商人士，扩大驱张声势，其次是欢送留法勤工俭学生和去南洋的一些教员，因为这些人中不少是新民学会会员。

就在我们快要启程出国的前夕，毛泽东同志为了欢送留法勤工俭学的同志和去南洋群岛的一批教员，并藉以联络新民学会和少年中国学会的感情，沟通两会会员的革命意志，毛泽东同志特举办联欢会。当时去法国留学和去南洋教书的都有两会的会员多人。记得联欢会是在农历三月初三旧俗称“踏青节”日，阳历是四月二十一日举行的。假法租界霞飞路松社，松社是纪念蔡锷的，因蔡锷别号松坡，故名松社。到会的约七、八十人。新民学会到的有毛泽东，彭璜，李思安，张国基，陈纯粹，欧阳泽等；少年中国学会到会的我认识的有康伯情，王光祈，魏嗣銓，涂开舆，左舜生等。其他还有去南洋的教员姜心培，郭鹿岑，王人统等。毛泽东和康伯情各代表自己的学会讲了话，会场是漫在嫩绿如茵的青草坪上，围坐成一个圆圈，还照了一张十二吋的大照片作纪念。这张照片，我保存

到一九二八年，因不便携带，寄存在上海邓脱路的一位孤老太太的家，因世变沧桑，老人久已不在人间，这张珍贵的纪念照已不知其下落，真是很可惜的。在开会的那天，还有一个给我印象最深的插曲，就是中午散会后，我们乘电车回来时，参加联欢会最年轻的张文亮，当电车行驶到毕勒路站，电车尚未停稳，他就急于下车，致跌倒昏迷。我们把他救护到他的住所，这一跌使他受了脑振荡，对文亮脑部一直都有影响。

松社联欢会不几天，当我们去南洋和留法同志们同乘法国邮船 *panl leat* 号离上海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亲自送我们到船上。他到每一个人的房间握手作别。临别时他还亲切地握着我的手，谆谆教导说：你要牢牢记住“改造中国与世界。”我们学会的宗旨，去切实执行。你们除教好自己同胞的子女和当地原居民亲善合作以外，还要多多地协助他们建国……待到邮轮汽笛长鸣，快要起锚时，他才依依不舍地下了轮船，和我们挥手作别。

关于海外华侨和华侨教育的情况。我国有句流行最广的俗话说：“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这是唯心主义的说法。我看我们若不出门，什么事情也不知道，遇事只能无知瞎说。譬如：有人认为华侨都是资产阶级，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所谓华侨资本家不过百分之一二，其它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劳动人民。当我第一次来到新加坡的时候，看到这里的华侨绝大多数来自广东和福建两省南部农村的劳动人民，他们在农村没有受过高深的教育，是在旧社会受尽贪官污吏，买办豪绅的压迫和剥削，为生活所迫，万不得已才离乡背井，经受千辛万苦来到海外的，有的甚至是被骗“卖猪仔”来到海外的。他

们既不会说英语，也不会说普通国语，只会说家乡的方言，更不具有特殊的技术能力。因此他们来到外国，都是一天到晚，一年到头，全靠辛勤劳动，朴素省俭地过活，把用血汗换来的工资，点点滴滴，积储起来，然后经营小商小贩，刻苦积累，有些进为中等商行，运气好的，进而成为富商，但这是很少的。

华侨的一个特点是富于爱乡爱国，团结互助的精神。因省县语言隔阂，没有统一组织，但都按各自的省、县、乡籍建立会馆或同乡会等团体，如福建会馆，广肇会馆，三江会馆等等，作为他们最高的统一领导组织。

进入二十世纪后，世界各国文化，科学进步神速，各种类型的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地蓬勃发展。东南亚地区的殖民主义者，也都顺应潮流，开设一些英文学校教育土著儿童，但对华侨儿童拒不收纳，纵有少数华侨资产阶级的子女能够进去，但收费高昂，也不是一般人所能担负得起的。于是一些思想进步热爱祖国的华侨领袖，主张由各会馆筹募教育基金自办学校。许多老一代的侨胞也感于自己过去没有受过好的教育，现在自己办了学校才能使后一代受到较好的教育，增进爱国爱乡思想，所以极力赞成。就在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八数年之间，新加坡的福建会馆，兴办了道南学校，爱同学校，和崇福女学，广肇会馆兴办了养正学校，嘉应会馆办了启发学校，潮州会馆办了端蒙学校，接着马六甲、檳榔、吉隆坡、怡保、柔佛等地的华侨都纷纷起来创办学校。开始的几年，因不易聘到教员，有些学校还是用方言教学。最奇怪的是：过去不收华侨学生的英文学校，这时看见华侨自己办学，又敞开大门广收华侨子弟了。

一九一九年以前，所有新加坡、马来亚华侨学校都只有七

年制的小学(初小四年高小三年)。还没有中学。热心教育的陈嘉庚先生因此在一九一九年春邀集当地华侨中的热心人士,倡办规模宏大的新加坡华侨中学校。一时来上学的有新加坡、马来亚远至印尼各地华侨学生,没有地域的限制。我是道南学校的专任教员,还在华侨中学和南洋女中两校各兼课四小时。这时华侨中学的总理(董事长)是陈嘉庚先生,校长是涂开舆先生,湖南人。南洋女中的总理是庄希泉先生,校长是余佩皋女士,江苏人。道南学校总理是陈敬贤先生(嘉庚先生的胞弟)校长是张接武先生,河北人。这三间学校的教职员工,多是外江人(华侨多是广东,福建两省人,其它中国各省的人都被称为外江人),用普通国语教学。教育学制和教课课本都是与国内学校相同的,若不出校,简直不知道是在国外。我把这些情况汇报给毛泽东同志以后,他就来信对我说:华侨教育应注重世界主义(来信见新民学会会员通讯集第二集)。

我是教语文、史地的,读了毛泽东同志的来信后,我就按照他的意见,把世界主义精神,从语文,历史教学中点点滴滴地去贯彻,学生都喜欢听,显见有良好的效果。

自从所有各地华侨学校废去方言采用普通国语教学后,就需要征聘大量能说普通话的教师。有的写信到祖国去聘请,有的在当地报纸上登广告征聘。这样,国内青年闻风自备旅费来到南洋的不少。我们湖南去的就有新民学会会员张国基,李思安,周敦祥,肖道五等七、八人。一师同学姜心培,杨潜德,谭超一,潘僂五,周维新,张祖砚,胡世忠,匡光照,谭云山,肖新田等十多人。其他还有文道衡,陈友古,刘子卓,周芜君,狄昂人,谭振权,周君南,胥书昶,郭鹿岑,王人统,宾士谋,黄